

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视角下的 泰国政治极化及其成因

周方冶

[摘要] 近年来,泰国政治极化日趋明显。2020—2021 年爆发的新生代大规模街头运动,公开提出“王室改革”的政治诉求,从而引起保守阵营尤其是极右翼的强烈不满。2023 年泰国大选后,2019 年崛起的极左翼政治势力开始取代中左势力的革新阵营主导地位,从而使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从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视角来看,泰国政治极化根源在于代际分歧引发的经济利益结构、政治权力结构、社会文化结构等多重失衡困境,各派力量在全面重塑国家运作体系问题上的矛盾持续激化。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末的 100 多年里,泰国曾先后经历三次重要的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并促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由此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但是,冷战后泰国的第四次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却迄今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由于国家发展道路转型的内生动力不足,泰国短期内很难摆脱政治极化风险。

[关键词] 泰国;政治极化;国家发展道路转型;代际分歧;极左翼

[中图分类号] D733.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23)06-0001-29

近年来,泰国政治极化日趋明显。2020—2021 年爆发的新生代大规模街头运动,更是公开提出“王室改革”的政治诉求,从而引起保守阵营尤其是极右翼的强烈不满。2023 年泰国大选后,随着极左翼强势扩张与中右势力全面垮塌,

[作者简介] 周方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泰国研究所名誉所长,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3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东南亚现代国家发展历史”(23VLS026)。

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泰国政治极化成因何在？本文将从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视角出发，对此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 极左翼崛起加剧泰国政治极化

政治极化或政治两极分化是近年颇为常见的现象与术语，通常是指政治态度偏离中间立场并出现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分歧，但其概念界定并未达成学术共识，更多情况下都是根据具体场景加以适用性描述^①。对泰国而言，政治极化主要是指不同政治权力集团在原则性立场上存在难以妥协的严重分歧，并引发大规模持续性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分裂。

泰国当前的政治极化问题始于 2005 年他信·西那瓦成功连任总理后爆发的“反他信”与“挺他信”权力博弈，并随后在“保革对立”格局下，进一步演化为保守阵营/“黄衫军”与他信派系/“红衫军”旷日持久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分裂^②。2014 年政变后，泰国政治极化问题在巴育军政府的压制下有所缓和，曾经势不两立的“红黄”两方开始各自朝着中间立场前进，但近年来崛起的极左翼势力却打破了“红黄对峙”格局，再次加剧了政治极化，并促成极右翼政党登上泰国政治舞台^③。

极左翼政治势力崛起于 2019 年大选。当时正值以“挺他信/红衫军”与“反他信/黄衫军”政治对立为主线的“保革冲突”趋于缓和，政治和解开始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主流话语表述。作为新兴政治势力，亿万富豪塔纳通领导的新未来党最初装扮为中间力量，并选择了橙色作为政党主色调，寓意着将在红（衫军）与黄（衫军）之间探求解决泰国现实问题的中庸发展道路^④。不过，随着大选政策辩论和线上/线下拉票工作的铺展，新未来党—塔纳通派系很快就呈现出极左翼政治色彩，并将选民目标锁定为新生代，尤其是“首投族”。大选结果揭晓后，新未来党成为政治黑马，赢得众议院全部 500 席中的 81 席，初次参选即

^① Andreas Schedler, “Rethink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8, Issue 3, 2023, pp. 335 – 359.

^② Dulyaphab Chaturongkul, “Thailand’s Ideological Struggle: Towards the Possibility of Depolarizing Thailand’s Polarized Polit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28, Issue 1, 2023, pp. 16 – 34.

^③ 周方治：《泰国政党格局从“两极对立”到“三足鼎立”》，《当代世界》2023 年第 11 期。

^④ Kevin Hewison, “Thailand’s Orange Wave: Progressives, Conservatives, and Monarchy”,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y 22, 2023,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thailands-orange-wave-progressives-conservatives-and-monarchy/>

力压老牌民主党，跃升为国会第三大党^①。

对保守阵营而言，相较于“挺他信/红衫军”更为激进的极左翼是显而易见的不安定因素。于是，保守阵营先是以太纳通在登记成为众议院候选人时持有媒体公司 V-Luck Media 股份为由，通过宪法法院于 2019 年 11 月判决撤销其议员身份^②，而后以新未来党接受塔纳通 1.912 亿泰铢（约合 4000 万元人民币）私人借款违反选举法有关政党捐款禁止条款为由，通过宪法法院于 2020 年 2 月判决解散新未来党，并判决塔纳通等 16 名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10 年内禁止从政^③。

从保守阵营与极左翼的初次交锋来看，得益于军政府期间的制度建构，前者在国家权力运作方面明显掌握主动。新未来党解散后，虽然其大部分资源都被皮塔领导的远进党所继承，但在各派势力分化拉拢下，极左翼拥有的众议院席位从 81 席降至 55 席，失去了不少国会话语权^④。于是，从 2020 年起，以新未来党被强制解散为导火索，泰国极左翼势力开始政治斗争重心转向，掀起大规模的新生代街头运动，试图激发自下而上的革新驱动力，并依托社交媒体的平台赋能，创新了“去中心化”的决策机制、“扁平化”的指挥链条、“快闪化”的行动方案、“二次元化”的诉求表达等政治斗争模式，使得“反巴育、反政府、反王室”的社会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甚至在 2021 年初邻国缅甸军方接管政权后，引发了地区性的线上线下跨国政治互动^⑤。

通过两次政治交锋，尤其是公开提出“王室改革”诉求，极左翼成功塑造了革新阵营的斗争形象，夯实了新生代基本盘，并引发广泛的政治辩论，树立了针对保守阵营“铁三角”既得利益的改革目标，从而为其在 2023 年大选的第三次交锋创造了有利条件^⑥。2023 年大选过程颇为出人意料。泰国权威民调机构 NIDA Poll 发布的连续民调数据显示^⑦，从 2021 年极左翼与保守阵营的第三次交

① “ข้อมูลสถิติ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สมาชิกสภาผู้แทนราษฎร พ.ศ. 2562”（《2019 年众议院议员选举统计》），泰国选举委员会官网，https://www.ect.go.th/ect_th/th/db_119_ect_th_download_14，2023 年 11 月 11 日。

② “Thanathorn Disqualified as MP”，*Bangkok Post*，Nov. 20, 2019，<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1798414/thanathorn-disqualified-as-mp>

③ “FFP Dissolved, Executives Banned for 10 Years”，*Bangkok Post*，Feb. 21, 2020，<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1862769/ffp-dissolved-executives-banned-for-10-years>

④ “Moving Forward: 55 Disbanded MPs Join New Party”，*Khaosod*，Mar. 9, 2020，<https://www.khaosodenglish.com/politics/2020/03/09/moving-forward-55-disbanded-mps-join-new-party/>

⑤ Aim Sinpeng, “Hashtag Activism: Social Media and the #FreeYouth Protests in Thailand”，*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 53, Issue 2, 2021, pp. 192–205.

⑥ Duncan McCargo, “Disruptors’ Dilemma? Thailand’s 2020 Gen Z Protests”，*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 53, Issue 2, 2021, pp. 175–191.

⑦ 参见 NIDA Poll 网站民调数据报告，<http://www.nidapoll.nida.ac.th>，2023 年 11 月 11 日。

锋开始，远进党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在 15% 左右浮动，而为泰党的民意支持率在 2021 年宣布他信小女儿贝东丹从政后一路攀升，曾达到 49.85% 的支持率峰值，因此通常认为后者将延续第一大党地位，并再次上演“泰爱泰党—人民力量党—为泰党”的他信派系“逢选必赢”传统剧目（见表 1）。但在大选前夕的民调中，革新阵营的民意支持率分布却出现逆转，远进党的支持率爆发式增至 35.36% 的历时峰值，不仅追平为泰党，而且在政治立场偏左的民调中，甚至大幅反超为泰党。

表 1 泰国众议院“保革冲突”议席分布情况

年份	第一大党				第二大党			
	政党	阵营	议席数	占比	政党	阵营	议席数	占比
2005 年	泰爱泰党	革新中左	377	75.4%	民主党	保守中右	96	19.2%
2007 年	人民力量党	革新中左	233	48.5%	民主党	保守中右	165	34.4%
2011 年	为泰党	革新中左	265	53.0%	民主党	保守中右	159	31.8%
2019 年	为泰党	革新中左	136	27.2%	民力党	保守中右	116	23.2%
2023 年	远进党	革新极左	151	30.2%	为泰党	革新中左	141	28.2%

资料来源：泰国选举委员会选举统计数据，参见 https://www.ect.go.th/ect_th/，2023 年 11 月 11 日。

从大选结果来看，远进党赢得了众议院全部 500 席中的 151 席，跃升为国会第一大党，而为泰党仅获得 141 席。这不仅意味着为泰党在大选前高调宣扬的“滑坡式”胜选预期破灭，而且标志着泰国“保革冲突”步入了新阶段，极左翼开始取代中左势力在过去 20 年里长期占据的革新阵营主导地位。伴随着极左翼强势崛起的是保守阵营在 2023 年大选中的全面溃败。中右势力的民力党与民主党，再加上极右翼的泰国人团结建国党（以下简称“泰团建党”），赢得众议院 101 席，占比仅为 20%，使得保守阵营再次面临 2005 年被全面压制的政治窘境（见表 1）。

针对极左翼，保守阵营尤其是极右翼呈现出强烈的应激性对抗情绪。泰团建党主席在演讲中公开宣称：“泰国是爱国者的土地，这片土地是神圣的，君主制是国家的支柱。如果你不喜欢它，你也无权改变它，因为整个国家都想要它。”“如果泰团建党成为下届政府的核心政党，我们将对恨国党和那些想推翻君主制

的人采取强硬措施。”^① 2023 年大选，泰团结党首次参选即赢得 476 万张政党名单制选票，虽然仅为远进党票数的 1/3，但却比同阵营的中右势力民力党票数高出近 8 倍，从而折射出保守阵营的政治极化倾向。

关于泰国政治极化成因分析，泰国本土学者与美西方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从意识形态视角出发，将“黄衫军”划归保守的王室民族主义与中产阶级的道德民主运动，而将“红衫军”划归农村民主运动，并认为是意识形态分歧引发了政治极化^②；从阶级/阶层视角出发，将政治极化归咎于阶级/阶层矛盾^③；从社会群体/网络视角出发，将“红黄冲突”解释为多元化的身份、利益与情绪分歧引发的政治/社会裂痕^④，等等。不过，相关研究较少从结构性的体系层面解释泰国政治极化，更多着眼于应然的价值评判，而非实然的演进研判，使得既有研究对于极左翼崛起引发的新一轮政治极化缺乏解释力。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泰国政治极化加剧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将从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视角展开分析。

如图 1 所示，国家发展道路转型是指对象国政治主导力量在内外因素影响下，为应对“跨越式”发展引发的“经济利益结构—政治权力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失衡现象，主动或被动开展结构性调整，以重塑国家运作体系动态稳定的再平衡过程。尽管发展中国家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结构性失衡问题，但通常情况下都是从单一结构性失衡开始，很少直接出现多重结构性失衡的并发问题，从而为对象国政治主导力量以国家运作系统中依然稳定的结构为支

^① “UTN Leader Vows to Drive Out ‘Nation Haters’”, *Bangkok Post*, April 8, 2023.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2545719/utn-leader-vows-to-drive-out-nation-haters>

^② See Chairat Charoensin-o-larn, “A New Politics of Desire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ailand”, in M. Montecano, Pavin Chachavalpongpun & Aekapol Chongvilaivan eds., *Bangkok, May 2010: Perspectives on a Divided Thail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2, pp. 87 – 96; อภิชาติ สถิตินิรามัย, ยุคดี มุกตวิจิตร, และ นิติ ภัครพันธ์, ทบทวนภูมิทัศน์การเมืองไทย (《重新审视泰国政治格局》), เชียงใหม่: แผนงานสร้างที่ดี สถาบันศึกษานโยบายสาธารณะ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ชียงใหม่, 2556.

^③ See Giles Ungpakorn, “Class Struggle between the Coloured T-shirts in Thailand”,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Vol. 1, Issue. 1, 2009, pp. 76 – 100.

^④ See Naruemon Thabchumpon, “Contending Political Networks: A Study of the Yellow Shirts’ and ‘Red Shirts’ in Thailand’s Politic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5, Issue 1, 2016, pp. 93 – 113; ปิ่นแก้ว เหลืองอร่ามศรี ed., กำเนิด และพัฒนาการเสื้อแดงในเชียงใหม่ (《变红：清迈红衫军的起源与发展》), เชียงใหม่: ศูนย์วิจัยและบริการวิชาการ คณะสังคม 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ชียงใหม่, 2556; Nick Nostitz, “The Red Shirts: From Anti-coup Protestors to Social Mass Movement”, in Pavin Chachavalpongpun ed., “Good Coup” Gone Bad: Thailand’s Political Developments since Thaksin’s Downfal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4, pp. 170 – 198; Patrick Jory & Jirawat Saengthong, “The Roots of Conservative Radicalism in Southern Thailand’s Buddhist Heartland”,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52, Issue. 1, 2020, pp. 127 – 148.

撑，针对失衡结构进行调整留下了缓冲时间和回旋空间。不过，如果对象国政治主导力量应对失措，就有可能在单一结构性失衡基础上，进一步引发双重甚至多重失衡，并使得结构性调整失去稳定支点而陷入“漂移”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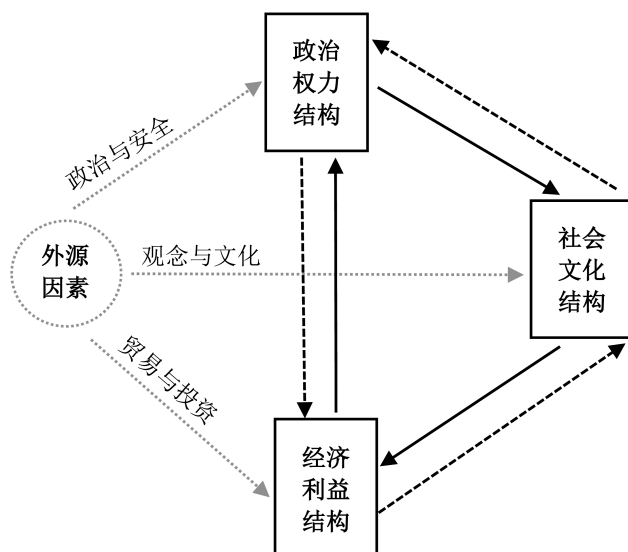


图1 国家发展道路转型的动态再平衡过程

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100多年里，泰国曾先后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并促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由此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还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不过，冷战后泰国的第四次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却迄今都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由城市中产阶级推动的“全面自由化”转型尝试，以及在21世纪初由他信派系推动的“他信道路”转型尝试中接连受挫，并付出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近10年政治社会分裂的沉痛代价^①。2014年巴育政变后，保守阵营开始推动新一轮转型尝试，但从2023年大选后政治极化的加剧来看，各方在国家发展道路转型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有可能引发新一轮政治动荡。

泰国当前面临的“政治极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第四次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过程中错失了前两轮结构性调整契机，而陷入“经济利益结构—政治权力结构—社会文化结构”的多重失衡困境，引发各派力量在全面重塑国家运作体系问

^① 周方治：《20世纪中后期以来泰国发展模式变革的进程、路径与前景》，《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5期。

题上的矛盾持续激化^①。具体来看，泰国政治极化的结构性成因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等方面，下文将逐一分析。

二 经济利益结构动因：代际更替引发的改革诉求

从2019年大选开始，泰国政治的代际分歧就表现得相当明显。极左翼力量强势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生代的拥护与支持。事实上，从基本盘来看，2019年大选中保守阵营的民力党与民主党、中间阵营的泰自豪党、中左势力的为泰党等头部政党所得选票合计约2450万张，而在2023年大选中上述政党再加上保守阵营新组建的泰团建党所得小选区制选票合计约2400万张（见表2）。如果将过去4年由于年龄或健康原因自然退出“选票池”的保守选票计入考量，那么总体而言，非极左翼的基本盘变化不大，尽管彼此间有分化重组，但流向极左翼的选票相对有限。这就意味着，极左翼在两次大选中所获支持票的爆发式增长，除了小部分来自“存量选票”，大部分源于过去10年的新生代“增量选票”。

表2 2019—2023年泰国大选票数分布情况

单位：张

阵营	政党	2019年大选		2023年大选			
		单一投票	占比	小选区制	占比	名单制	占比
保守极右	泰团建党	—	—	360.7万	9.48%	476.6万	12.55%
保守中右	民力党	843.3万	23.34%	418.6万	11.00%	53.7万	1.42%
保守中右	民主党	394.7万	10.92%	227.8万	5.99%	92.5万	2.44%
中间阵营	泰自豪党	373.2万	10.33%	513.3万	13.49%	113.8万	3.00%
革新中左	为泰党	792.1万	21.92%	934.0万	24.54%	1096.2万	28.86%
革新极左	新未来党	626.6万	17.34%	—	—	—	—
革新极左	远进党	—	—	966.5万	25.40%	1443.8万	38.01%

^① 周方治：《“泰式民主”的转型困境》，《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

(续表)

阵营	政党	2019 年大选		2023 年大选			
		单一投票	占比	小选区制	占比	名单制	占比
有效投票		3613.8 万		3805.7 万		3798.7 万	
总计投票		3826.8 万		3951.4 万		3949.7 万	
投票率		74.69%		75.64%		75.61%	

资料来源：泰国选举委员会选举统计数据，https://www.ect.go.th/ect_th/，2023 年 11 月 11 日。

从表 3 可见，2012 年泰国人口统计中 10 - 19 岁年龄段的人口约为 900 万。其中大部分人口在 2011 年大选中由于年龄原因尚未取得投票权，而在 2014 年政变后，则由于政治原因一直无法行使投票权，直到 2019 年军方“还政于民”举行大选，才成为新生代“首投族”。从民调来看，当时大部分新生代“首投族”都选择了极左翼的新未来党，从而使其成为政治“黑马”，首次参选就赢得了 626 万张选票，跃居国会第三大党。而在过去 4 年间，参照 2012 年泰国人口统计中 5 - 9 岁年龄段人口近 400 万的数据估算，2023 年新增加的“首投族”约为 320 万。从民调来看，这部分选民大多选择极左翼远进党，从而使其基本盘在前身新未来党的基础上猛增过半，力压革新阵营的“带头大哥”为泰党，问鼎国会第一大党^①。

表 3 泰国新生代人口增长情况

单位：人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20 年	2022 年
0 - 4 岁	3,815,730	3,735,837	3,565,020	3,314,100	3,071,469	2,900,560
5 - 9 岁	3,983,567	3,939,851	3,885,043	3,852,428	3,743,954	3,725,691
10 - 14 岁	4,160,322	4,023,611	3,983,268	3,986,869	3,906,378	3,980,113
15 - 19 岁	4,846,762	4,669,627	4,332,511	4,050,413	3,987,528	4,037,251
20 - 24 岁	4,675,038	4,757,235	4,808,033	4,747,669	4,498,162	4,208,166
总人口	64,456,695	65,124,716	65,931,550	66,413,979	66,186,727	66,090,475

资料来源：参见泰国统计局网站，<http://statbbi.nso.go.th>，2023 年 7 月 30 日。

^① 参见 NIDA Poll 网站民调数据报告，<http://www.nidapoll.nida.ac.th>，2023 年 11 月 11 日。

从泰国政党政治发展来看,极左翼崛起前各政党基本盘通常是以地域为依托的垂直模式。21世纪初崛起的他信派系,虽然在传统掮客政党模式上搭建了“新兴资本集团—农民群体”政治联盟,有效拓展了政党的跨地域影响力^①,但其基本盘依然存在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主要在北部和东北农村地区,并且难以染指民主党在南部地区的基本盘。与此相对,极左翼新未来党/远进党以代际为依托的水平模式基本盘,使其有可能跨越泰国政党的地域壁垒,形成全国性的政治攻势。2023年大选中,远进党在为泰党/他信派系的传统“票仓”清迈府赢得多个议席,从而冲击了泰北政治生态。极左翼在政党基本盘上立足新生代的创新变革,与20年前他信派系依托农民群体达成政治崛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胜在敏锐把握了泰国经济利益结构的关键痛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泰国社会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跨越式”发展引发的结构性失衡,使得“城乡分化、地区分化、贫富分化”成为国内复苏的重要障碍。对此,作为新兴资本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信派系提出了“他信经济道路”:一方面,对外开放,搭乘全球化尤其是中国经济的“顺风车”,为国内经济复苏提供牵引;另一方面,对内改革,借助民粹主义“草根政策”,为农民群体提供生活生产补助,释放农村经济活力,并以加杠杆方式推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②。他信派系有效回应了在政治权力结构中被长期边缘化的农民群体诉求,从而为“新兴资本集团—农民群体”政治联盟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从根本上保证了自2001年首次参选以来他信派系“逢选必赢”的国会第一大党地位。

尽管在21世纪前20年“挺他信/红衫军”与“反他信/黄衫军”的“红黄对峙”期间,保革双方轮流上台执政,但即使在保守阵营掌权期间,也以各自的表述方式保留了他信派系的“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核心理念。无论2008年“司法政变”上台的民主党阿披实政府,还是2014年“军事政变”夺权的巴育军政府,都在内政外交上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延续性。这使得泰国在过去20年里,不仅人均GDP从2001年的1890美元稳步增至2019年疫情前的7630美元^③,而且有效改善了“三大分化”的结构性问题。从城乡分化来看,以2001年他信胜选上台为转折点,泰国城市化率摆脱了长期停滞,再次呈现增长态势——从2000年的33.73%稳步增至2021年的59.54%,有效改善了原本紧张的城乡关系(见

① 周方治:《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动力、路径与困境》,《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

② 李峰:《他信经济学及其对后他信时代泰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

③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 2023年10月12日。

图2)。从地区分化来看,随着泰国中央政府持续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尤其得益于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和诸如“一乡一品”(OTOP)政策的引导,曾经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被长期边缘化的北部和东北地区,开始发力追赶全国的步伐。如图3所示,虽然首都大曼谷区在户均月收入方面依然遥遥领先,但其与第二梯队中部/南部地区,以及第三梯队北部/东北地区的差距正逐步减少。2004年,大曼谷区户均月收入为2.8万泰铢,相当于第二梯队的两倍,以及第三梯队的近三倍。到2021年,大曼谷区户均月收入增至3.9万泰铢,提升近30%;而第二梯队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增至2.81万泰铢和2.66万泰铢,分别提升72%和84%;至于第三梯队的北部和东北地区则分别增至2.1万和2.15万泰铢,其增幅更分别高达92%和115%(见图3)。从贫富分化来看,泰国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已从2000年的0.43稳步降至2021年的0.35^①。更重要的是,泰国贫困问题得到显著改善,全国贫困率从2000年的38.48%下降至2021年的4.79%(见图2),从而切实提升了国民生活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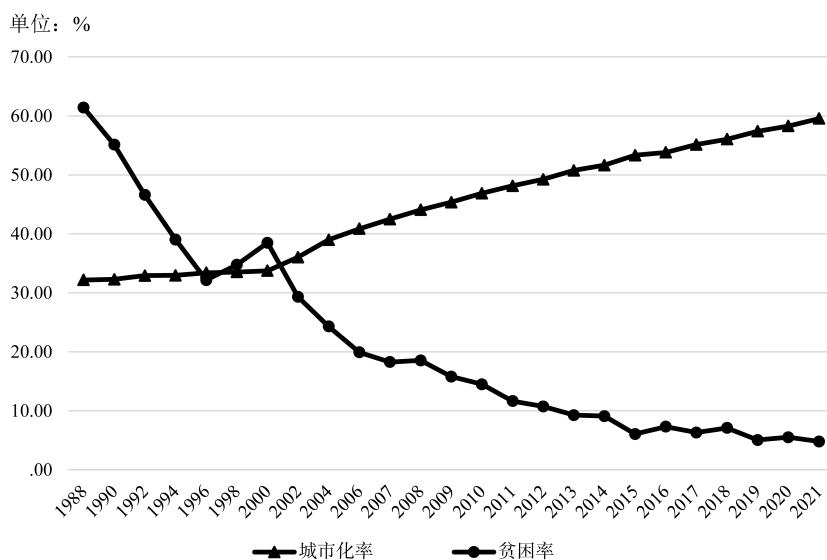


图2 泰国城市化率与贫困率情况

资料来源: 参见泰国统计局网站, <http://statbbi.nso.go.th/>, 2023年10月12日。

^① 参见泰国统计局网站, <http://statbbi.nso.go.th/>, 2023年10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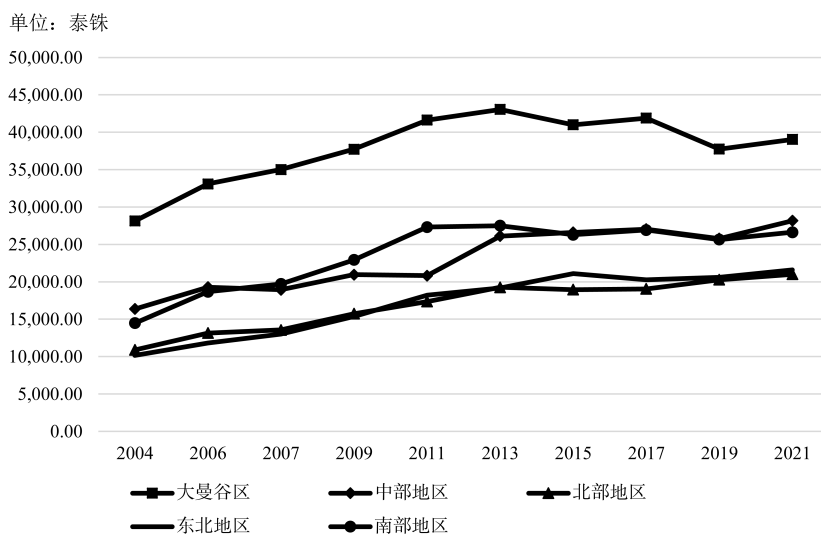


图3 泰国各地区户均月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参见泰国统计局网站，<http://statbbi.nso.go.th/>，2023年10月12日。

不过，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生的新生代，对于泰国社会经济发展，却有着与长辈颇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与感知。如图4所示，泰国社会经济在遭受亚洲金融危机沉重冲击后，曾一度落入谷底，但随即就搭乘全球化尤其是中国经济“顺风车”开始复苏与新一轮增长。因此，对新生代而言，在其相对有限的成长记忆中留存的除了“保革冲突”的政治社会撕裂，就是经济持续向好的乐观态势。但是，近年来泰国经济增长步伐放缓，再次面临发展瓶颈，使得新生代曾视为理所当然的稳步增长与持续改善前景变得不再确定，甚至可能不复存在，从而引发强烈的焦虑与不满。

客观来看，当前泰国面临的发展困境，既有三年疫情的“黑天鹅”冲击，更有结构性的“灰犀牛”难题。一方面，随着美西方逆全球化与中美经济“脱钩”等外部风险持续上升，依托海外市场的出口牵引力持续下降，难以再为泰国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支撑（见图4）；另一方面，过去20年的城市化进程，使泰国中央政府与家庭负债都显著上升，很难再通过单方面的加杠杆方式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见图5）。对于“他信经济道路”改革红利消失、依托既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客观现实，无论保守阵营还是中左势力都有清晰认知，并通过《国家20年发展战略规划（2018—2037年）》拟定了新的发展路径，试图借助“工业4.0”契机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不过，姑且不论长期享有既得利益的保守阵营，即使是过去20年享受了全球化尤其是中国

经济红利中的中左势力，也无意推动泰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改革，而是倾向于“增量改良”，以尽可能规避不确定性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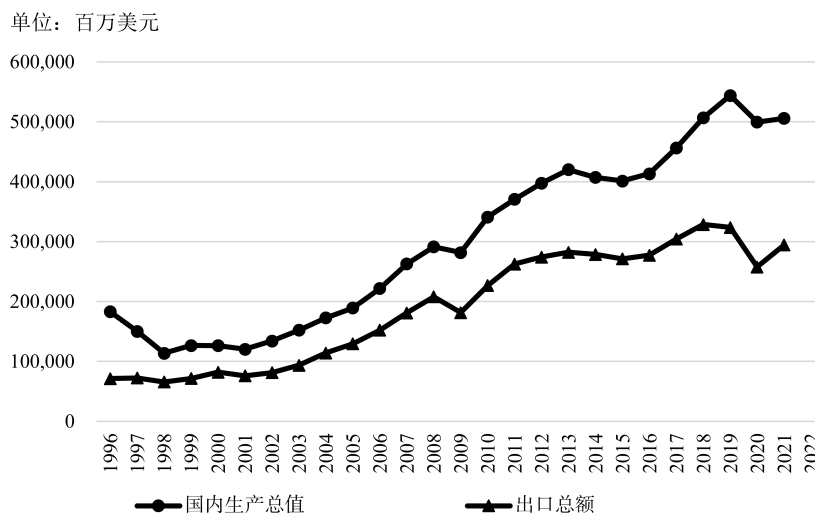


图 4 泰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出口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2023 年 10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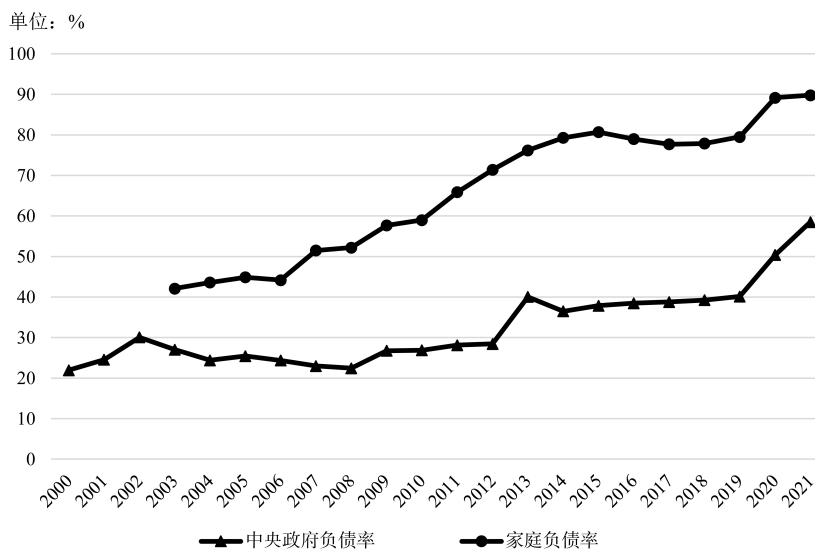


图 5 泰国中央政府与家庭负债情况

资料来源：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2023 年 10 月 12 日。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守阵营与中左势力的审慎策略有其合理性，但在新生代看来，却是执政者以“不作为”方式将经济衰退风险进行代际转嫁，试图迫使新生代承担不利后果^①。从图6可见，过去10年间，新生代就业压力持续上升，而在国内经济活动中，新生代的劳动参与率则持续下降，从而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代际收益的持续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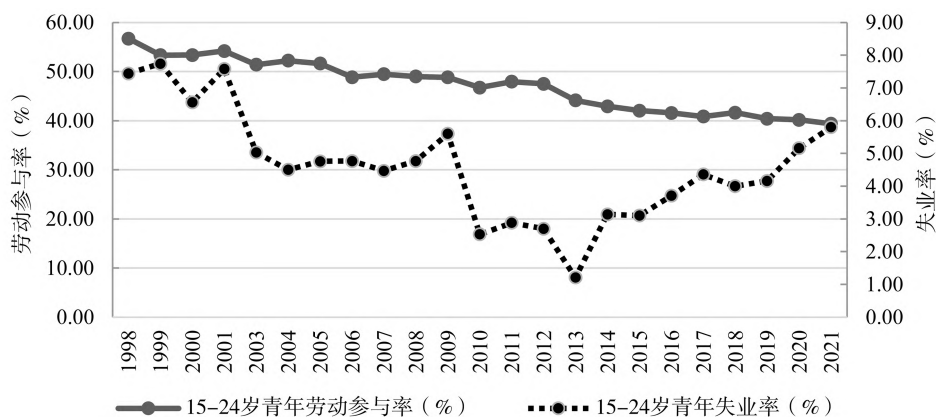


图6 泰国15-24岁青年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2023年10月12日。

作为泰国新生代的政治代言人，极左翼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体系化的国家发展道路构想，更多还是碎片化的变革诉求，但从远进党在2023年大选前推出的300多项政策^②不难发现，新生代对经济利益结构的变革期许，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发展红利均等化，即要求通过国家二次分配，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保障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子女补助、失业补助、养老补助、丧葬补助、廉价交通、廉价水电、廉租房、国家分配田地等，从而使包括新生代在内的所有群体都能均等享受泰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红利。

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泰国新生代对社会经济持续衰退的悲观预期，尤其是对“工业4.0”转型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试图获取更多的抗风险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1世纪初的“他信经济道路”也强调社会保障，并率先推出了

^① Chyatat Supachalasai, “Thai Youth Liberation as a PoliticoEconomic Force: A Critique of Hierarchical Capitalism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53, Issue 4, 2023, pp. 712 - 723.

^② 参见远进党网站，<https://election66.moveforwardparty.org/policy>，2023年7月30日。

“30 泰铢治百病”等民粹主义惠民政策，但作为新兴资本集团代言人，他信派系更重视的是“发展机会”的初始性平等，因此主要是调整社会经济发展红利“增量”部分的红利分配，旨在激发社会活力；而当前泰国新生代所要求的则是“发展红利”的结果性均等，故而极左翼将目标锁定为社会经济发展红利“存量”部分的重新分配，并将矛头指向包括保守阵营“铁三角”在内的既得利益群体。根据泰国发展研究所在大选前发布的评估报告，远进党为兑现其竞选政策，将至少需要新增高达 1.3 万亿泰铢的预算^①。相较于泰国政府 2024 财年 3.35 万亿泰铢的预算规模^②，极左翼的政策目标明显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从而引起泰国发展研究所的质疑与担忧，认为在疫情后经济社会复苏乏力情况下，有可能引发严重的中央政府债务危机（参见图 5）。对此，远进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新的方式完善税收体制，使财政收入每年增加 6500 亿泰铢”，其主要税负承担者为曼谷政商集团与城市中产阶级，并表示将通过一系列的军队改革举措，包括裁减军队、压缩军费、裁撤将官、清理军用土地、接管军队商业资产等为国家财政节省至少“每年 500 亿泰铢”^③。同时，虽然远进党在大选期间规避了极为敏感的王室改革议题，但对极左翼尤其是激进学生团体而言，王室财产与王室预算始终是其重点关注对象^④。

其二是发展决策去中心化，即要求通过权力下放，使地方上对发展方向与模式拥有更多的自主决策权，从而有可能通过灵活资源配置形成独特的发展路径，不再受制于中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推动府尹从任命改为民选，以及更大比例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

在 20 世纪以前的泰国封建王朝时期，地方贵族势力拥有高度自治权，但随着 19 世纪末朱拉隆功改革废除“分封制”并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中央政府开始全面接管地方权力，并引发了长期性的“央地矛盾”，尤其在“跨越式”

① “ข้อสังเกตเรื่องต้นทุนทางการเงินข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และที่มาของเงิน: วิเคราะห์จากเอกสารที่พรรคการเมืองยื่นเสนอต่อ กทต” (《对政策财务成本和资金来源的观察：根据政党向泰国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的评估分析》), 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30 เมษายน 2023, <https://tdri.or.th/2023/04/policy-costing-comments/>

② “Cabinet Approves B3.35tn Budget for 2024 Fiscal”, *Bangkok Post*, Jan. 10, 2023,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2479352/thailands-cabinet-approves-100bn-budget-for-2024-fiscal-year>

③ “ข้อสังเกตเรื่องต้นทุนทางการเงินข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และที่มาของเงิน: วิเคราะห์จากเอกสารที่พรรคการเมืองยื่นเสนอต่อ กทต” (《对政策财务成本和资金来源的观察：根据政党向泰国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的评估分析》), 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30 เมษายน 2023, <https://tdri.or.th/2023/04/policy-costing-comments/>

④ “The Demonstration at Thammasat Proposes Monarchy Reform”, *Prachatai*, Aug. 11, 2020, <https://prachataienglish.com/node/8709>

发展阶段更是与“城乡分化、地区分化、贫富分化”叠加共振，从而增加了国家权力体系的结构张力^①。冷战后，泰国社会对“权力下放”的政治诉求与日俱增，并于1997年促成“权力下放”正式写入宪法。随后，泰国不仅颁布了以《1999年权力下放规划与进程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而且专门成立了“国家权力下放委员会”（NDC）专门负责规划和指导相关工作。虽然在过去20多年里，泰国在地方自治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逐步完善了地方自治体制，但总体上不及社会普遍预期^②，不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比例未达标，而且在地方行政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府尹（省级最高行政长官）依然是内政部直接任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地方自治权的有效落实。2014年巴育政变上台后，更是放缓了权力下放进程，从而引起泰国社会尤其是新生代的普遍不满。

其三是发展目标多元化，要求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与市场垄断，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保障弱势群体发展权，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修复生态环境等，从而形成更公平、更包容、更富有弹性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在20世纪中后期的“跨越式”发展阶段，泰国曾在相当长时期内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目标，从而引发诸多结构性矛盾。为此，泰国前国王拉玛九世提出了“充足经济”理念，强调发展目标多元化，尤其是“以人为本”^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泰国社会开始反思发展目标异化问题，并将“充足经济”理念写入了“五年计划”和宪法，试图探求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近年来，巴育政府进一步提出了“生物—循环—绿色经济”（BCG）模式并在2022年的曼谷峰会上被正式采纳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的一部分^④。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来看，泰国在过去20年里进步明显。其百分制指标得分从2000年的66.87分稳步上升到2022年的74.74分，在全球166个国家中位居第43位，不仅在亚洲仅次于日韩，排名第三，而且在东南亚国家高居榜首^⑤。但在极左翼新生代看来，由于保守阵营既无意也无力瓦解“铁三角”尤其是曼谷政商集团的

① Supasawad Chardchawarn, “Local Governance in 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Roles of Bureaucrats, Politicians, and the People”,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V. R. F. Series*, No. 459, 2010, pp. 9 – 11.

② Danny Unger and Chandra Mahakanjana, “Decentralization in Thailand”,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Vol. 33, No. 2, 2016, pp. 172 – 187.

③ 周方治：《全球化进程中泰国的发展道路选择——“充足经济”哲学的理论、实践与借鉴》，《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6期。

④ “2022 Leaders’ Declaration”, APEC, Nov. 19, 2022, <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leaders-declarations/2022/2022-leaders-declaration>

⑤ Jeffrey D. Sachs et 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3: Implementing the SDG Stimulus*, Dublin: Dubl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64 – 465.

市场垄断地位，因此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无序扩张引发的发展目标异化问题，所谓 BCG 模式也不过是曼谷政商财阀以“可持续发展”为名进一步巩固市场垄断地位的政策工具，其本质上与发展目标多元化的初衷背道而驰^①。于是，相较于保守阵营和中左势力各政党都会提及的各类“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的竞选政策，极左翼远进党更为强调从体制机制层面彻底瓦解曼谷政商集团的市场垄断地位，诸如放开酒类专营权、放开影视业准入许可、放开可再生能源电力销售、放开金融执业牌照、严格落实《贸易竞争法》等，从而在大选前明确回应了新生代对根本解决发展目标异化问题的政治诉求。

三 政治权力结构动因：政治动员与组织模式创新

从政治权力结构来看，“政治极化”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极左翼新生代作为政治权力集团的形成与崛起，进而对原先占据核心圈层政治主导地位的保守阵营“铁三角”产生挤出效应，引发极左翼与保守阵营尤其是极右翼的政治冲突与对抗（见图 7）^②。虽然尚未完全定型，但与泰国既有的其他政治权力集团相比，极左翼新生代在社会根基、动员方式、组织形态等方面都已呈现出显著差异，并对原有政治生态产生冲击。

对于政治权力集团而言，拥有相似的社会经济发展诉求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能否成型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动员与组织能力是否达标。从泰国原有政治权力集团来看，王室—保皇派、曼谷政商集团、地方豪强集团等主要依托传统“庇护制”关系，而军人集团则主要依托成建制的军队指挥体制。与此相对，城市中产阶级虽然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直到 90 年代移动通讯开始普及，才依托“手机网络”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拥有了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话语权。反观农民群体，则是长期缺乏政治动员与组织能力，从而被排斥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之外，直到新兴资本集团崛起，才在后者的资金与互联网技术加持下，依托他信派系的“红衫军”网络拥有了政治话语权。

^① Piyaporn Wongruang, “Ahead of Election, Thailand’s Green Development Vision under Fire”, China Dialogue, May 9, 2023, <https://chinadialogue.net/en/climate/thailand-election-green-development-vision-under-fire/>

^② 有关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模型分析，参见周方治：《政治环境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东南亚国家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8—4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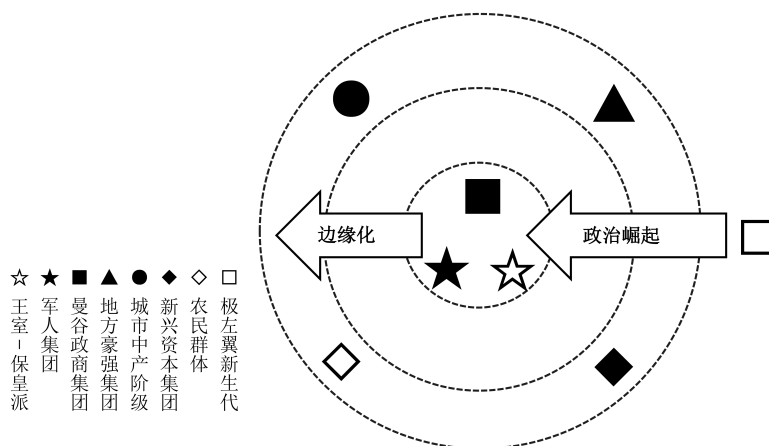


图7 泰国“政治极化”权力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泰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代际收益的严重分化，但都未曾产生代际层面的政治权力集团，而是在政治动员成本与组织手段的约束下，最终趋向于地区或行业分化，收敛为边界清晰的政治行为体。例如，20世纪初的代际分歧所催生的主要是军人集团与文官集团，并促成了1932年的民主革命与君主立宪政体；而20世纪中后期的代际分歧所催生的则主要是曼谷城市中产阶级，并促成了1992年的民主运动与1997年“民主里程碑”宪法颁行。当前，泰国极左翼新生代政治权力集团的初步成型，很重要的就在于随着信息通讯技术进步，新生代通过对社交媒体的灵活运用，有效突破了既有政治权力集团的局限性，创新了更契合信息化时代的政治动员与组织模式。

（一）从政治动员来看，极左翼新生代拥有社交媒体的竞争优势

21世纪以来，泰国信息化建设突飞猛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互联网渗透率仅为0.36%，而手机用户数则是每百人3.6部，主要局限于曼谷中产阶级。2006年政变时，这两项指标分别升至17.1%与60.5部；到2014年政变时，翻了一番至34.9%与138.8部；到2021年，更进一步升至85.3%与168.8部（见图8），均高于东南亚国家平均水平^①。随着当地民众能以更快速率和更低价格获得上网服务，曾经占据社会信息沟通与交流主导地位的传统方式逐步让位于信息网络。

^①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2023年10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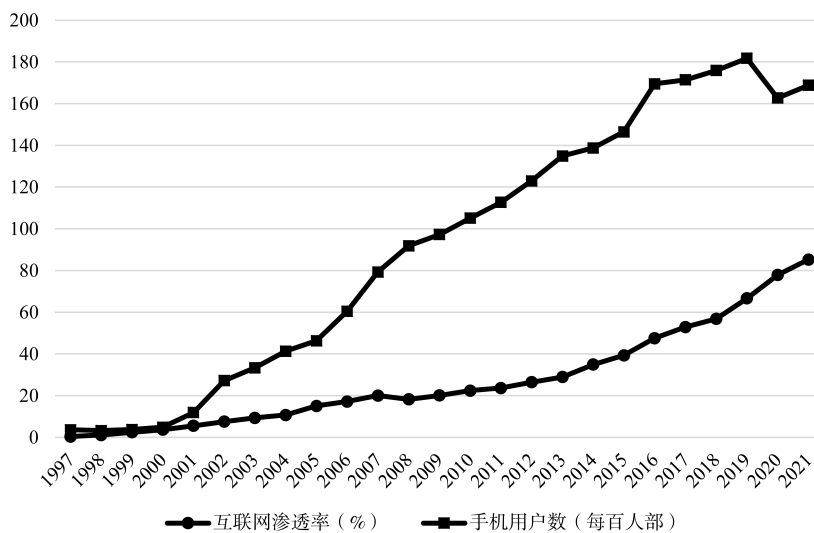


图8 泰国信息化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2023年10月12日。

据统计，当前泰国民众日均上网时长超过8小时，远超传统纸质媒体的2.5小时，电视媒体的3.5小时，以及广播媒体的0.8小时^①。相较于成年后才接触互联网的中老年人群，泰国新生代是伴随着信息化建设成长起来的“虚拟空间原住民”，从而对互联网生活更熟悉，也更为依赖。以泰国使用率最高的社交媒体“脸书”为例，其用户数量高达5560万，占泰国总人口的比重为79.3%，而在各年龄段的用户组中，18-24岁用户占比20.5%，25-34岁用户占比30.7%，显著高于35岁以上用户组^②。这就使得极左翼新生代更容易通过社交媒体开展政治动员，并相对于既有政治权力集团形成了相当显著的竞争优势。

1. 社交媒体传递信息成本低，有助于摆脱政治资金瓶颈

对政治权力集团而言，政治动员的首要工作就是将“动议信息”尽可能及时准确详实地传递给本集团成员，而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凝聚共识和协调行动。泰国既有政治权力集团的“动议信息”通常经由线下途径传递，不仅初始成本较高，而且在信息传递衰减的影响下，还面临边际成本递增问题，因此在政治动员过程中，普遍面临“扩大规模”与“资金短缺”相冲突的发展瓶颈。事

^① Simon Kemp, “Digital 2023: Thailand”, Datareportal, Feb. 13, 2023,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3-thailand>, p. 24.

^② 参见 NapoleonCat 数据库，<https://napoleoncat.com/stats/facebook-users-in-thailand/2023/01/>，2023年7月13日。

实上，即使是前电信业大亨他信及其派系主导的“红衫军”网络，由于受到当时泰国信息化建设水平限制，也主要采取“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政治动员方式，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大量使用传统广播媒体，因此成本并不低，必须依托新兴资本集团持续性的政治献金，方能形成对农民群体的有效政治动员^①。

与此相对，极左翼新生代依托高速发展的信息化建设浪潮，依托社交媒体平台展开线上政治动员，其性价比极高，尤其是近乎无成本的网络信息复制过程，使得多数情况下仅需要少量美工和文案工作的一次性投入，即可达到传统媒体大规模重复性投入的信息传递效果。同时，得益于互联网“用户生成内容”机制，“动议信息”很容易在一次传播的基础上，引发二次传播的指数性扩散效果，进而实现信息传递边际成本递减。这就使得极左翼新生代有可能以有限资金开展大规模、高频次的政治动员，从而摆脱了政治资金对传统政治权力集团的瓶颈约束。数据显示，泰国大选期间，在“脸书”上使用“#election23”标签的最受欢迎帖子中有56%与远进党有关，并获得了1000多万次互动（例如点赞和分享），其中超过80%的互动引发了积极情绪，是排名第二的为泰党互动次数的6倍多。而在TikTok上远进党更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与“election23”相关的热门账户、话题标签和关键词大多数都与远进党有关。远进党总理候选人皮塔的TikTok官方账户获得1470万个赞，而其主题标签获得了超过100亿次浏览，是排名第二的为泰党及其领袖相关内容浏览量的20倍^②。

2. 社交媒体联络成员覆盖面广，有助于克服地理空间限制

泰国虽非大国，但国土面积也超过了50万平方公里，因此对传统政治权力集团而言，要在现实空间搭建线下成员网络的难度相当大，通常都局限于首都曼谷地区，而在外府地区则以遴选代表方式间接沟通，甚至有意无意地进行选择性忽视。不过，随着泰国信息化建设覆盖全境，依托社交媒体的“虚拟空间”搭建线上成员网络开始成为现实。通过社交媒体的手机APP软件，无论个体身处何地，都能同步获取政治动员的相关信息推送，从而与极左翼新生代群体保持紧密联系。

在2019年大选中，新未来党借助社交媒体成为“黑马”，首次参选就成功跃居第三大党。在2020—2021年街头政治运动中，极左翼新生代更是将社交媒体

^① Naruemon Thabchumpon, “Contending Political Networks: A Study of the ‘Yellow Shirts’ and ‘Red Shirts’ in Thailand’s Politic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5, 2016, pp. 93 – 113.

^② Aim Sinpeng, “Thailand Moves forward in Social Media Election”, *East Asia Forum*, July 28, 2023,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7/28/thailand-moves-forward-in-social-media-election/>

全覆盖的政治动员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致使“反巴育、反政府、反王室”运动在全国遍地开花，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政治运动主要在首都曼谷地区开展的地理空间局限性。在2023年大选中，极左翼新生代再次发挥社交媒体的政治动员能力拉票，并在压倒性的线上曝光率支持下，将远进党推上了国会第一大党宝座。根据谷歌统计的大选前泰国各政党互联网检索数据，从5月4日至14日大选当日，远进党的互联网曝光率高达56%，远高于排名第二的为泰党（15%），以及泰团结党（9%）、泰自豪党（7%）、民力党（4%）等^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远进党支持率会在大选拉票最后阶段爆发式上扬甚至反超为泰党的技术性原因。

3. 社交媒体互动交流效率高，有助于在政治博弈中抢占先机

对于政治权力集团而言，政治动员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指令传达，而是成员间互动交流以达成合作共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一致行动的磋商过程。事实上，即使是泰国组织最严密、执行力最强的军人集团，如果缺乏必要的合作共识，也很难在政治博弈中有效保持一致行动。例如，1973年“10·14”民主运动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军人集团新旧势力更替引发的派系内讧^②。因此，政治动员过程中的反复磋商，始终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传统磋商通常以线下方式开展，虽然有利于以“面对面”交流方式增进政治互信，避免不必要的错判与误解，但受制于时间、地点、人数等，其效率相对较低，难以及时有效地推动政治动员进程并取得预期结果。这也是传统政治权力集团通常都以地区或行业作为边界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尽可能提高线下磋商效率，以抢占政治博弈先机。随着极左翼新生代依托社交媒体引入线上磋商方式，传统线下磋商的效率困境日益明显。通过“虚拟空间”进行磋商，不仅从根本上摆脱了现实空间的时间、地点、人数等限制条件，而且有助于从结构上优化磋商流程，使原本“信息传递—意见反馈—磋商决策—信息传递”的继发式流程，转变为各环节并发式流程，从而极大压缩了政治动员所需的时间^③。

（二）从政治组织来看，极左翼新生代呈现“去中心化”

作为依托社交媒体形成的政治权力集团，极左翼新生代在组织结构上主要以

^① See “Google Trends Thailand General Election 2023”, https://trends.google.com/trends/story/TH_cu_gFV31YcBAABwQM_en, July 30, 2023.

^② Thak Chaloeontiarana, *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Despotic Paternalis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2007, p. 230.

^③ Kanokrat Lertchoosakul, “The Rise and Dynamics of the 2020 Youth Movement in Thailand”, Heinrich-Böll-Stiftung, Feb. 2022, https://eu.boell.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2/Thailand%202020%20youth%20movement_FINAL.pdf

互不统属的多元化意见领袖作为节点构成分布式网络，因此总体上呈现“去中心化”的结构特征，并显著区别于传统政治权力集团。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顶层架构来看，极左翼新生代更倾向扁平化，而非科层化

泰国传统政治权力集团普遍面临内部资源“错位分布”问题，即社会/经济资源拥有者与政治行动执行者并不一致，因此需要内部机制承担资源“向上收集—集中转化—向下分配”的调配职能，从而在资源转移过程中很容易形成等级明确且持续自我强化的科层制架构。不过，在极左翼新生代运用社交媒体开展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以“流量”为核心的信息资源拥有者与政治行动执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不需要科层制的顶层设计进行资源调配，包括“在线捐赠”在内的流量红利就会自然而然地涌向最具政治执行力的分布式网络节点，从而使政治意见领袖间更多体现为对等的竞合关系，而不是有约束力的统属关系。

扁平化的组织架构为极左翼新生代提供了高度的灵活性，使其在街头运动中聚散自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保守阵营“斩首行动”的政治威胁。不过，缺乏约束力的扁平化组织架构，也使得极左翼新生代在线下政党政治活动中面临纪律性严重不足的问题。2020年新未来党被强制解散后，除去被禁止从政的党执委外，剩余65名议员仅有56名加入“备胎”远进党，其余9名跳槽泰自豪党，占比高达14%^①。

2. 从目标选择来看，极左翼新生代更包容异质化，而非同质化

泰国传统政治权力集团通常倾向于在内部建构同质化的主体话语表述，以强化“自我认同”的群体共识。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凝聚力，强化“我者”与“他者”区隔，降低政治动员的成本与难度；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执行力，避免多元诉求影响既定核心政治目标的优先度，尤其在必要时便于做出取舍。不过，对依托社交媒体开展政治动员的极左翼新生代而言，追求同质化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在社交媒体的分布式网络下，极左翼新生代的政治认同本质上是建立在“反传统”纲领性话语框架的多元化政治目标聚合基础上的，并且在算法推送机制以及“信息茧房”的影响下，任一目标都有大量“粉丝”支持者。这就使得极左翼新生代提升影响力的最合理选择是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异质化共同体，而不是承受分裂风险，对多元化政治目标进行优先度排序。

高度包容的异质化目标使得极左翼新生代能跨越阶层、行业、性别等壁垒，

^① Nattaya Chetchotiros, “9 Defect to Bhumjaithai”, *Bangkok Post*, Feb. 26, 2020,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1865549/9-defect-to-bhumjaithai>

将不同群体聚合成为政治共同体，从而在短期内就拥有了压倒性的选举优势。不过，难以排序的多元化政治目标，也使得极左翼新生代无法在限制性条件下进行理性取舍。2023 年大选中远进党提出的 300 多项不分先后的竞选政策，以及显著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新增项目预算，折射的正是极左翼新生代脱离现实的理想化政治短板。

3. 从代表推选来看，极左翼新生代更崇尚民粹化，而非精英化

泰国传统政治权力集团在推举代表参与政治博弈时，通常都倾向于采取精英主义做法，尽可能遴选最具权威、最有资历、最为理性的政治人物，以保证在“权力—利益”的博弈中能纵观全局，做出最有利于本集团中长期发展的正确决策，并在必要时能顶住压力做出让步，放弃中短期的预期甚至是既得利益^①。不过，由于政治精英通常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历练与培养，尤其是要有“老中青”传帮带方能形成充裕且可持续的人才储备，因此，对于以代际分歧为社会根基的极左翼新生代而言，客观上面临政治精英人才储备不足的现实困境，短期内很难推行精英主义做法。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流量为王”的底层行为逻辑，也使得极左翼新生代从主观上不信任“曲高和寡”的精英主义，更偏好能在短期内获取大量“粉丝”的民粹主义做法。

2023 年大选前，远进党推出了“网络投票”方式推选众议员候选人，使得大量网红式的政治新人登场。据统计，2019 年代表新未来党参选的全部 350 名候选人中，仅有 57 名进入远进党的候选人名单；而在 2019 年大选中当选的 31 名新未来党众议员中，仅有 8 名众议员代表远进党在原选区再次参选^②。民粹主义的代表推选方式，一方面，有效提升了远进党的民意支持率。2023 年大选中，远进党在社交媒体最活跃的首都曼谷选区取得压倒性胜利，横扫全部 33 个议席中的 32 个席位，其中初次参选即当选者占比高达八成^③。但另一方面，也对远进党的政治决策形成显著约束，使其难以承受社交媒体压力，无法在政治博弈中审时度势，做出自主选择。2023 年大选后，远进党牵头组建“革新联盟”，但旋即就迫于社交媒体压力，单方面撕毁协议，将国家发展克拉党逐出政治联盟。理由

^① 周方治：《东南亚政治领袖“个人权威”现象研究——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视角》，《南洋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② 参见远进党网站，<https://election66.moveforwardparty.org/>，2023 年 7 月 17 日。

^③ “ประกาศ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 เรื่อง ผล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สมาชิกสภาผู้แทนราษฎรแบบแบ่งเขตเลือกตั้ง”（《选举委员会公布众议院小选区制议员选举结果》），ราชกิจจานุเบกษา, ๒๐ มิถุนายน ๒๕๖๖, เล่ม ๑๔๐ ตอนที่ ๓๖ ก, หน้า ๔๑-๖๒。

是后者的党主席功（Korn Chatikavanij）曾在“红黄对峙”中为保守阵营站台，难以得到远进党“粉丝”的认同。对此，远进党主席皮塔通过推特发文自责：“我深刻反省。我将永远牢记，党大于个人，人民（粉丝）大于党。”^①

四 社会文化结构动因：“泰式民主”话语体系衰落

作为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过程中最具惰性的关键变量，社会文化结构的规制和仪轨通常都会被政治主导力量作为“减震器”，以应对经济利益结构的变革诉求以及政治权力结构的更替压力。不过，如果在社会文化结构基本稳定的“改良”阶段未能及时完成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并借助“正反馈”形成自我强化，那么随着经济利益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失衡的加剧，社会文化结构难免在“负反馈”的持续作用下失衡，甚至面临主体性重塑。

泰国当前社会文化结构的官方主流话语形成于 20 世纪中后期的冷战时期，其核心构件是以“泰式民主”概念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与传统道德标准。冷战结束后，随着泰国开启第四次国家发展道路转型，“泰式民主”话语体系由盛转衰，尤其在 2016 年拉玛九世驾崩后失去了锚定“泰式民主”概念的社会基石，从而引发社会文化结构失衡。

区别于经济利益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再平衡过程中较理性的“权力—利益”务实博弈，社会文化结构再平衡具有显著的外溢性。围绕主流话语的存续废立，各方除了理性算计之外，还存在强烈的感性冲动，从而造成在前两者再平衡过程中保持沉默的大量中间力量活性化，并投身于“非此即彼”的观念冲突与对抗。

2023 年大选中，中间阵营与中右势力的政党名单制得票远远少于小选区制基本盘得票，而极右翼与极左翼则相反，远进党政党名单制得票甚至要比小选区基本盘得票高出近五成（见表 2），其中折射的就是泰国严峻的观念分歧，以及由此引发广大基层选民“选边站”的政治冲动。

泰国保守阵营“铁三角”近年来一直努力复兴“泰式民主”话语体系，而极左翼新生代则对此表现出强烈的质疑与不满情绪，并试图引入美西方价值观，以替换既有社会文化结构的核心构件，从而避免在“权力—利益”的博弈过程中重蹈他信派系覆辙，成为“泰式民主”话语体系下的政变牺牲品。具体来看，

^① “Move Forward Party Backtracks on Chart Pattana Kla Joining Coalition”, Thai PBS World, May 20, 2023, <https://www.thaipbsworld.com/move-forward-party-backtracks-on-chart-pattana-kla-joining-coalition/>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王室改革”运动，否定国王权威的社会中心地位

从泰国近现代发展史来看，国王的地位几经起伏。从19世纪末朱拉隆功改革建立君主专制政体，到20世纪初拉玛六世引入“立国三原则”即“国王、宗教、国家”观念，传统王权神圣性与民族主义思潮有机结合，使得国王的地位达到巅峰^①。1932年民主革命后，国王权威曾在相当长时期内被持续弱化和取代，社会地位也跌落谷底，直到20世纪60年代军人领袖沙立政变夺权，并在中南半岛冷战意识形态斗争推动下创设“泰式民主”话语体系，国王权威才得以复兴，并稳步重返泰国社会中心地位^②。

时至今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化发展，“泰式民主”话语体系已融入泰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话语表述，则是明确写入宪法的“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体制”^③。这一表述并不是通常意义上“君主立宪制”的泰国式修辞，而是对“王室民主”独特模式的“有效委婉表述”^④，本质上映射的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泰国社会以国王权威为中心，逐层外扩的“曼陀罗式”传统等级结构^⑤。

对于“泰式民主”话语体系而言，“国王权威”既是其逻辑出发点，也是其现实立足点。事实上，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泰国社会就不乏对“泰式民主”话语体系的质疑与非难，但在拉玛九世的国王权威拒止下，始终不成气候。在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民主运动中，拉玛九世依托国王权威平息了政治乱局。随着军人总理素金达与民运领袖占隆匍匐在御座前聆听圣谕的影像广泛传播，拉玛九世的社会声望再次攀升，并获得“民主庇护者”的时代光环，从而拥有了拒止民主化浪潮的政治免疫力。得益于拉玛九世提供的“立足点”，“泰式民主”话语体系作为冷战遗产，却在冷战后20多年里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即使在“红黄冲突”时期，他信派系也从未正式提出变革“泰式民主”的政治诉求^⑥。

① ทีระสิทธิ์สยามรัฐพิพิธภัณฑ์สวนลุมพินี พระ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๒๔๖๘ (《1925年伦披尼公园暹罗王国展览纪念品》)，ทีระสิทธิ์สยามรัฐพิพิธภัณฑ์สวนลุมพินี พระ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๒๔๖๘ 167。

② 周方治：《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兴衰的过程、原因与趋势》，《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金勇：《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制：当代“泰式民主”的文化建构》，《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

④ Thongchai Winichakul, “Thailand’s Hyper-Royalism: Its Past Success and Present Predicament”,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No. 7, 2016, p. 4.

⑤ 周方治：《“泰式民主”的转型困境》，《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

⑥ Michael K. Connors, “Article of Faith: The Failure of Royal Liberalism in Thai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8, Issue 1, 2008, pp. 143 – 165.

不过，拉玛九世的国王权威主要建立在其个人魅力与功业基础之上，具有显著的个人属性，因此在2016年拉玛九世驾崩后，作为“泰式民主”立足点的国王权威也随之动摇。近年来，尽管王室一保皇派一直在努力建构新王权威，但原本在个人魅力方面就不及先王的拉玛十世，根本无法在短期内形成足以比肩拉玛九世历时数十载积累的庞大个人功业，从而使国王权威面临严重的空心化困境。这就为极左翼新生代提供了重要历史契机。

2020—2021年新生代大规模街头运动期间，激进派学生领袖在公开集会上提出了“王室改革十大要求”，从而首次将“保革冲突”政治矛头指向国王权威^①。2023年大选前，极左翼远进党进一步将修订刑法第112条“冒犯君主罪”列入竞选纲领，试图以此为切入口，逐步瓦解“泰式民主”为国王权威提供的制度壁垒，改变拉玛九世时期的“泰式民主强化——国王权威上升——泰式民主再强化”正循环进程，转而促成“国王权威下降—泰式民主衰落—国王权威再下降”的负循环进程，并最终从根本上否定国王权威的社会中心地位。

（二）通过“个性自由”运动，否定程式化的日常行为规范

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泰国当代社会文化保留着相当程度的传统等级观念。除了沙立执政时期所复辟的以匍匐礼为代表的王室礼仪，泰国人在求学、礼佛、入职、婚嫁、丧葬、饮宴、觐见尊长等方面都有程式化的日常行为规范，从而将“泰式民主”话语体系下的“曼陀罗式”秩序观念，通过“知行合一”印刻到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②。

对于20世纪中后期正处于“跨越式”发展阶段的泰国社会而言，建立在血统、年资、财富、地位、学识、功德等传统衡量标准上的等级秩序，有助于引导所有人按部就班，从而为社会运作提供高度可预测的稳定前景，降低结构性风险，提升泰国对海外投资的持续吸引力^③。不过，随着21世纪以来泰国稳步跨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执着于“上下尊卑”的传统社会秩序开始变得不合时宜，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创新发展的客观需要。地位上的阶层固化、思想上的墨守成规、体制上的因循守旧，都在严重束缚着新生代尝试新事物、迎接新挑战、开拓新局面的进取精神，尤其是旨在强化顺从意识的传统陋习，诸如校园里的学长霸

^① Hathairat Phaholtap & David Streckfuss, “The Ten Demands that Shook Thailand”, *New Mandala*, Sep. 2, 2020, <https://www.newmandala.org/the-ten-demands-that-shook-thailand/>

^② Patrick Jory, *A History of Manners and Civility in Thai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5.

^③ Jim Glassman, “Lineages of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Thailand: Military Dictatorship, Lazy Capitalism and the Cold War Past as Post-Cold War Prologu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50, Issue 4, 2020, pp. 571–592.

凌新生、军营里的长官役使新兵、职场里的前辈欺压新人等社会现实，更引发新生代强烈不满。作为“虚拟空间原住民”，经由互联网的社交媒体，泰国新生代要比年长者更容易接触到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观念，也更容易在算法推送机制的“信息茧房”影响下产生激进立场，尤其是三观尚未完全成型的未成年人，更容易形成“青春期叛逆式”的改革诉求，试图颠覆年长者视为惯例的日常行为规范。

在2020—2021年的新生代大规模街头运动中，相当引人瞩目的是以中小學生为主体的“坏学生”运动。相较于其他新生代成年人的政治改革诉求，“坏学生”运动所要求的主要是校园日常行为规范改革，尤其是取消对学生发型与着装的强制性规定，允许中小學生选择更具个性的自由装扮^①。虽然在极左翼的政治运动中，“坏学生”运动的诉求看似无关紧要，但为其站台的美西方非政府组织却不在少数^②。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坏学生”运动倡导的“个性自由”所撬动的是构成泰国社会文化基石的日常行为规范，尤其是随着参与和支持“坏学生”运动的中小學生日渐成长并步入社会，其变革诉求也将从校园进一步持续扩散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中长期自下而上瓦解“泰式民主”话语体系的社会根基。

（三）通过“新价值观”运动，否定传统道德的正当性话语权

尽管泰国并未在宪法中将上座部佛教定为国教，但对九成以上民众崇信佛教且成年男子通常都要有一次以上剃度出家经历的“黄袍佛国”而言，以佛教价值观为基础的传统道德，始终是泰国社会运作的基本规范与根本准则。在“泰式民主”话语体系下，无论是国王权威的中心地位，还是“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其正当性都建立在上位者相较于下位者拥有更高的传统道德境界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因此，如何有效掌握传统道德的正当性话语主导权，从而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对政治对手进行压制，也就成为既往影响泰国政治博弈胜负的关键要素。

对保守阵营而言，依托拉玛四世创立的上座部佛教法宗派，从佛教价值观的阐释出发，抢占甚至垄断传统道德的正当性话语主导权，始终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传统政治斗争策略。拉玛十世继位后，保守阵营以僧王继承为契机，修订了《僧伽法》，发动了宗教净化运动，整肃了“亲他信”的法身寺派系及各类上座

^① “‘Bad Students’ Not Your Typical School Troublemakers”, *Bangkok Post*, Nov. 20, 2020,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2022963/bad-students-not-your-typical-school-troublemakers>

^② Sunai Phasuk, “Thailand’s ‘Bad Students’ Are Rising Up for Democracy and Change”, *The Washington Post*, Sep. 17,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09/17/thailands-bad-students-are-rising-up-democracy-change/>

部佛教“异端”，并任命深得拉玛十世信任的法宗派长老为新僧王，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传统道德的正当性话语主导权^①。

与此相对，由于缺乏历史积淀，革新阵营在“保革冲突”的传统道德话语权竞争中始终处于下风。面对保守阵营的道义压制，他信派系即使拥有中下层选民的多数票支持，也难以摆脱“多数暴政”、“选举独裁”和“金权政治”等政治正当性质疑与否定，结果先后两次成为军人集团“拨乱反正”的政变对象^②。

于是，极左翼新生代在面对保守阵营的道义压制时，采取了与他信派系不同的政治策略，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传统道德话语权竞争，转而引入美西方价值观，试图从根本上颠覆以佛教价值观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话语权，瓦解“泰式民主”话语体系的前提假设。2023年大选前，极左翼远进党以倡导“自由民主人权”为名，一方面，将“赌博合法化”“色情业合法化”“佛教节日售酒合法化”等列入竞选政策^③，试图从制度层面弱化作为泰国传统道德“压舱石”的上座部佛教基本戒律；另一方面，以《平等婚姻法》为抓手，以美西方“骄傲节”庆典为助力，试图将“LGBTQ+”权益保护推升到社会道义制高点，并借此在传统道德之外，建构起更契合美西方价值观的新道德话语^④。依托破旧立新的“新价值观”运动，极左翼新生代很有可能在中长期以“平替”方式，逐步抢占甚至取代保守阵营在道德层面对政治正当性的话语主导权。

余 论

2023年7月11日，泰国看守总理巴育宣布结束政治生涯，并退出极右翼泰团建党^⑤。随着巴育退出政坛，以及极左翼新生代再次走上街头^⑥，保守阵营主导下历时9年的第三轮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尝试最终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相较前两

^① Tomas Larsson, “Royal Success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Pur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Thai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52, Issue 1, 2022, pp. 2–22.

^② Gwendoline Promsopha & Antoine Vion, “Elite Circulation, Rent-Seeking and Rank-Keeping: Analytical Insights from the Case of Thailand”, Taylor & Francis Online, Feb. 2, 2023,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0346764.2023.2171099>, pp. 1–23.

^③ 参见远进党网站, <https://election66.moveforwardparty.org/policy>, 2023年7月27日。

^④ “Bangkok Pride 2023—The Next Step Is to Legalise Marriage Equality”, Thai PBS World, June 9, 2023, <https://www.thaipbsworld.com/bangkok-pride-2023-the-next-step-is-to-legalise-marriage-equality/>

^⑤ 《泰国总理巴育宣布退出政坛》，新华网，2023年7月11日，http://www.news.cn/world/2023-07/11/c_1129744359.htm

^⑥ “Rallies Spring Up in Defence of Pita, MFP”, *Bangkok Post*, July 21, 2023,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2615022/rallies-spring-up-in-defence-of-pita-mfp>

轮转型尝试失利留下的“烂摊子”，当前泰国形势更为严峻，不仅经济利益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失衡加剧，而且曾经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也开始失衡，使得泰国社会运作体系的内循环总体上呈现“漂移”状态，缺乏足以提供有力支撑的再平衡“锚点”。

短期来看，尽管历经三个月的组阁危机后，泰国在中左势力与保守阵营的政治妥协下，搭建了“红蓝联盟”的跨阵营赛塔政府，并以流亡海外17年的前总理他信主动归国投案后获得国王特赦为标志，开启了“保革和解”的政治进程。但是，中长期来看，泰国依托内生动力促成“三大结构”再平衡的难度系数偏高，即使最终勉强得以实现，也很可能要反复磨合，并付出沉重的社会经济代价。

随着泰国内在稳定性的持续下降，外源因素影响力将有可能进一步提升，并在内外因素互动过程中，为泰国国家发展道路再选择注入新动力。从“地缘引力结构”来看，中美两国影响力长期都在泰国外源因素中居于首要地位^①。作为冷战以来的泰国军事盟国，美国曾经在泰国第三次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规制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泰式民主”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②。但在当前泰国国家发展道路再选择过程中，美国所扮演的却一直是“麻烦制造者”角色，无论是扶持极左翼新生代传播美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③，还是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保守阵营交出政治主导权^④，都不仅无助于缓和泰国的结构性矛盾，反而会进一步激化代际冲突，导致“三大结构”再平衡变得更为困难，而引起泰国社会的质疑与不满^⑤。

区别于美国试图直接干涉泰国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文化结构的不负责任行径，中国始终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泰国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⑥。但对泰国面临的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困境，中国也从未袖手旁观，而是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的近邻优势，通过贸易、投资、跨境服务、技术合作

① 周方治：《中美战略博弈下的东南亚“地缘引力结构”解析：路径与方法》，《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② 周方治：《“泰式民主”的转型困境》，《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

③ “Britain, US Express LGBTQ + Support”, *Bangkok Post*, June 27, 2023,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general/2600063/britain-us-express-lgbtq-support>

④ “US to Support ‘Effective, Stable, Democratic Govt’ in Thailand”, *Bangkok Post*, June 7, 2023,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2587014/us-goal-to-support-an-effective-stable-democratic-government-in-thailand>

⑤ “Rally Outside Embassy Tells US to ‘Stop Interfering’”, Apr. 21, 2021,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2102755/rally-outside-embassy-tells-us-to-stop-interfering>

⑥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巴育》，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7年9月4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7-09/04/content_5222604.htm

等方式，努力在互利共赢基础上为泰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从而有利于其经济利益结构在“增量改良”条件下更平稳有序地达成再平衡，避免“存量改革”困境引发的矛盾激化与持续冲突。

泰国正在开启新一轮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尝试，能否结束长期以来的政治动荡与社会撕裂，不仅取决于泰国精英们妥善处理国内问题的政治智慧，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美博弈下如何趋利避害引入外源因素的战略视野，尤其是把握“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契机^①，通过经济利益结构再平衡，重构体系“锚点”，结束内循环“漂移”困境。中长期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疫后复苏与产业升级，泰国将有可能逐步化解新生代不满情绪，促成代际和解，并在重塑发展共识基础上，携手铺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孙斐娟】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国王国关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11月19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211/t20221119_10978190.shtml

Abstracts

Thailand'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Its Caus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ath Transformation

ZHOU Fangye

【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Thailan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litically polarised. The mass street move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that erupted in 2020-2021, which openly put forward the political demand for “royal reforms”, has aroused strong resentment from the conservative camp, especially from the far-right. After the Thai general election in 2023, the far-left political forces raised in 2019 began to replace the center-left force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reformist camp, further increas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path, Thailand'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s rooted in the multiple imbalances of “Economic Interest Structure-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Social & Cultural Structure” caused by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Due to the lack of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ailand's national development path, it is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the risk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short term;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ex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ailand to resolv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 Keywords 】 Thail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ath;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Far-Left (Politics)

【 Author 】 ZHOU Fangye, Associate Researcher,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